

不屈的战士

——吴伯涵烈士传略

张保友 闫 峻

土地革命初期，活跃在固始东部的革命群众组织扁担会，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声势之大，战果之辉煌，在豫皖边区是空前的。正是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打盐卡、抗地租、砸民团、除匪患，给反动统治阶级以有力地打击，尽管最后遭到敌人的镇压，但在开展武装斗争，造成割据局面以及配合主力红军消灭敌人，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鄂豫皖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烈士吴伯涵就是扁担会的创始人和后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虽然已经殉难九十余了，但他忘我的牺牲精神和光辉的革命业绩，人们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

吴伯涵原名吴为凡，祖籍河南省固始张广庙杨井村。1898年4月出生于一个地主阶级家庭，是时吴家有田地七百多亩，并在张广、王集两镇开办了粮行、线行、药店等店铺，全家老少四十口，长工、伙计十多人，生活比较富裕。由于父辈的苦心经营，可谓人财两旺，为远近各家所不及，在当地享有一定的威望。

伯涵幼小时聪明过人，善于思考问题，遇事总好问个究竟，深受家人邻里喜爱。1912年秋入泉河铺正直镇高级小学读书，由于勤奋好学，进步很快，在家庭和学校，伯涵初步接触到一些社会问题，比如穷人帮富人做工，出尽牛马力，却受冻挨饿；贫民百姓的孩子衣衫褴褛，放牛拾柴上不起学，即或进了学校，也要受到豪门子弟的欺凌和冷眼等等。这些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伯涵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时他为此愤愤不平。

1914年以后，江梦霞（毕业于开封河南省立高等优级师范学校，后为我党早期党员，开封党组织创始人之一）来正直镇小学任国文教员。江梦霞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讲述中华民族的伟大，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进而阐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以唤起学生的爱国热情。他积极提倡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奴化，教育学生“好男儿志在四方”、“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上学求知，不能只顾家庭或个人的升官发财，要为国家着想，为社会服务”，以培养学生的斗争精神。他还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同情劳动人民，站在劳苦大众一边，江老师的谆谆教导，简直使吴伯涵着了迷，他不仅铭记在心，而且还和一些进步学生一道参加江老师亲自带领和组织的植树、修路、帮助农民挖塘修坝等义务劳动。尽管抹脏了衣服，劳累了身躯，但每当劳动归来，伯涵总是无限的喜悦。共同的理想和志向，犹如一条纽带，把伯涵和江

老师这两颗滚烫的心，紧紧地系在了一起。伯涵十分尊敬老师，特别崇拜江梦霞老师，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向江老师求教，汲取政治营养；江老师对热情、好学、诚实、豪爽的吴伯涵也非常喜爱和器重，更加注意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不遗余力地精心培养和耐心辅导，江老师的教育、启迪，为后来吴伯涵的健康成长，奠定了牢靠的思想基础。他的“立志做大事，而决不做大官”的志向就是这时确立的。

1919年吴伯涵的启蒙老师江梦霞应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张鸿烈（固始县人）之聘，前往该学校任教员，因为伯涵和他的老师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在江老师的积极荐举下，吴伯涵也于次年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学习，他决心不负老师的重托和家人的期望，刻苦攻读，努力攀登知识的高峰，他除了出色地完成校方设置的各科专业课程的学习任务外，较多地和江老师及其他进步师生接触，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不只一次地高举旗帜，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参加集会、游行，并开始观察社会研究现实。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江梦霞更加成熟了，努力寻求革命真理，积极致力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紧扣着吴伯涵的心弦。在省城开封，吴伯涵亲眼目睹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掠夺，北洋军阀政府的屈膝叛卖，造成历史古都乃因整个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匪患四起，民不聊生的现实。暗暗痛下决心，

为拯救中华民族，为国家的复兴做一番事业。

在开封学习时，吴伯涵经常利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到一些手工业作坊做工，一方面身体力行，接近工人群众，增强阶级友爱，另一方面学习生产技术，掌握操作工艺。他的织袜织帽技术，就是这个时期在南城丁姓袜铺学会的。

1922年吴伯涵以优异的成绩告别了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走上了新的征途。

(二)

1923年冬，已经在开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江梦霞，回到家乡潢川，准备在县城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经过与进步青年杨笠生、杨萍如、刘理葛、刘康孚和寒假从南京上学返家的徐智雨等会晤、计议，决定建立袜厂，以取得合法身份，并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吴伯涵应江梦霞之聘，来到潢川，参加了袜厂的筹建工作。袜厂由吴伯涵、江梦霞等七人合资经营，共投入资金两仟元，其中吴伯涵投资五百元。厂房借用刘理葛家的住宅，坐落在潢川城内顺东关街。办厂的宗旨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进步思想，组织进步力量，联络革命工作；适应社会需求，生产价廉耐用的棉袜棉帽，以抵制“洋袜”“洋帽”；安置部分贫困的进步青年，筹集部分革命经费。

建厂时，江梦霞负责全面领导和组织工作（江后来回开封，由刘理葛任经理，主管工厂）；刘康孚负责帐目和日常

事务；吴伯涵任师傅，进行技术指导和管理，并负责一些思想进步政治可靠的青年工人的组织和教育工作。

工厂名称及商标，按照组成人员入股先后秩序，定名为“六一”袜厂，商标图案为一个胖娃娃（意为中国的新生），天真烂漫地玩弄着两个骰子（赌具，又叫色子），一个骰子上显一个红点（象征共产党），一个骰子显六个绿点（代表劳苦大众）。寓意中国要获得新生，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起来革命才能实现。借以唤醒亿万民众投身革命的洪流。

经过充分地准备，修整了门面、厂房，购置手摇织袜机二十台和必要的原材料，招收技工和学徒六十名。1924年4月，吴伯涵等人在门前挂上“六一袜厂”的匾额，张贴了“焚香除废气，燃蠋放豪光”的对联和“劳工神圣”的横眉，在鞭炮声中正式开业投产。

袜厂从开业那天起，就成了党联系进步青年的场所，蔡仲美、吴丹坤、苏井观、徐智雨、冯新宇、蒋镜清、张彦武、张相舟等一批热血青年（这部分人以后大都投身革命，成为党的领导骨干）都先后到过袜厂，江梦霞经常从开封带回《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分给青年们阅读。还同他们议论国事，评击时弊，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我地下党员也以做生意为名，到该厂接头，传递文件，开展革命活动，袜厂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这期间，吴伯涵作为江梦霞的得力助手，除搞好生产管理外，凭借织袜“师傅”的合法身份，为接待、联络各地有志青年和党的秘密“交通”，为传递党内文件和情报，做了大量的工作。对豫东南进步思想传播和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

在以“六一”袜厂为依托的革命局面打开以后，吴伯涵经过组织同意，继续作为袜厂的股东、师傅，于1926年夏，回到了家乡——固始县张广庙，这里本来就是穷乡僻壤，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百姓终年不得温饱，加之大匪首蔡筱谷办起民团，与恶霸董秉成、万子新狼狈为奸，为害乡里，闹得人们走投无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家乡的境遇，使伯涵目不忍睹，他毅然决定和贫苦的乡亲一起，改变这种黑暗的世道。

这时，伯涵的家庭是富裕的，几年前与姜氏结婚，关系尚好，已有一个女儿，当时其家庭的主持人、堂弟吴伯洲曾说：“大哥回到家来，可以无忧无虑，坐享其成。”伯涵没有留恋优厚的物质生活，分享朝夕团聚的家庭幸福，而是通过关系，当上了张广庙小学校长，栖身于庙堂，伺机开展革命活动。

1926年的张广庙小学，只有两个班，学生五六十人，冷冷清清。为扩大招生名额，改变东乡文化落后的状况，吴伯

涵冲破重重阻力，组织全体师生，动员自己家里和岳父家里的长工参加扩建校舍，他亲自动手和大家一道，将张广庙的中庙、北庙泥菩萨推倒，“活佛爷”砸烂，改庙堂成教室；将五十余亩庙田收归学校所有，课租由学校支配，并开辟了操场，筑起了围墙，到1927年，学生迅速增至二百多人，教师十多人，伯涵利用校集、朝会和课堂，经常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号召学生讲科学，学文化，反对封建迷信；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后来，公开提出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争民主，争自由的口号，他还带领学生参加修路、栽树等义务劳动；亲自组织学校文娱队编排节目，到街头演出；在自编的短剧《可怜的秋》中他扮演地主老财，通过表演，把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罪恶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吴伯涵在全力办好学校的同时，十分注意接触地方进步人士和贫苦农民。在这里，他通过一个“玩猴人”继续和“六一”袜厂保持联系；以同乡同学的关系和县委书记蔡仲美接上了关系，并于1927年冬，经蔡仲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还将刚从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回来的张仲武及时聘请为教员，以壮大学校进步力量；当地一些贫苦农民也经常到这里寻求生存的出路。

1927年，继甲寅之后的连年灾荒，广大农民的生活极端困苦，为了活命，他们纷纷出外扛长工，或三三两两肩挑担

运，贩卖食盐、山货；有的则全靠两个肩膀一条扁担，为人担脚挑货，卖力气，以挣钱糊口，就是这样一些人，却成了税卡、盐卡、土匪盗贼抢的对象，遇到税卡、盐卡，有时被重罚，有时被没收；遇到拦路的土匪，则被洗劫一空，经常赔本折利，严重的还遭到毒打。于是人们自发地由跑单帮到结伙，人多势众，官卡土匪也不敢轻举妄动。后来，这些做生意的，担脚运货的都成了一帮帮、一伙伙的，其中以帮工出身的向德根、孙金友一伙人数最多。

向德根、孙金友、王二、王老背等人都是吴家的佃户或长工，在交往中他们感到伯涵正直、有学问，好为穷人鸣不平，因而很敬重他，伯涵也常为他们排忧解难，思想上已产生了共鸣，在吴伯涵的倡导下，又邀来邻居祝文才等，在张广庙学校聚会。他们烧纸钱、喝血酒、发誓言，结成把兄弟，成立了“烧香会”，大家推选吴伯涵任会长，伯涵经常给会友们讲梁山好汉杀贪官、除污吏，打富济贫的故事；讲贫富并非命运注定，要过好日子，必须起来斗争等道理；并指点他们躲卡跑税的方法，巧妙地与官卡、民团周旋。随着人数的增加，为更好地组织和动员民众与官匪开展斗争，同年六月，将“烧香会”改为“扁担会”，经过秘密串联，三个月，会员发展到六十多人，吴伯涵继续任会长。这时的斗争策略也由消极防御到主动自卫，由对付盐卡、税卡到惩治地霸。扁担会初步成为抵卡抗税（租）的群众组织，有效地保护了

农民的利益，打击了官卡土匪的嚣张气焰。

（四）

“四一二”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到处一片白色恐怖。“三一八”大荒坡农民暴动失败，更加剧了豫东南的恐怖气氛，为保存革命火种，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固始县委由城关移至东乡张广庙。以扁担会为依托，重整党的组织。在豫东南特委的指导和吴伯涵的全力配合下，县委得到了充实和加强，蔡仲美继续任书记，吴伯涵任组宣部长，熊超一等五人为委员，特委委员易宗帮作为吴伯涵的“客人”，住在吴的家里，参与领导工作。

为便于活动，伯涵早在1928年春天已借助于家庭势力和亲属关系，打入蔡筱谷民团内部，当上了分队长，在伯涵任张广庙小学校长时，同蔡筱谷已有过接触，因为有文化，能干事，曾得到过蔡的赏识。伯涵当了“分队长”掌握了手下十余人（枪），借此合法身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县委根据豫东南特委的指示，积蓄、发展革命力量，在时机成熟时，组织农民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造成割据局面。吴伯涵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任务更大了。他既要当好校长、“分队长”，更主要的还要当好部长、会长，终日奔波不息。

在纷繁的工作中，伯涵首先抓住了扁担会的整顿和扩大。1928年冬扁担会已发展到近百人，按照会员分布，设了

桂桥、杨井、九龙、草河头四个分会，并确定了负责人。十二月，吴伯涵和蔡仲美先后在周家河湾和湖塘埂秘密召开会员大会，集体讲述了扁担会是由穷苦的农民百姓组织，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山里来了共产党，只有跟着党，打土豪、分田地，推翻旧社会，建立新政权，才能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等道理。会上进行了组织纪律教育，要求每个会员“一切行动听指挥”、“千万保守组织秘密”。会后把讲话的主要内容，如“打倒土豪劣绅”、“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建立苏维埃政府”等让会员熊岐周写成传单标语，贴在泉河、张广、罗集、石庙等地。

1929年年3月13日，吴伯涵、蔡仲美等七人，作为固始的代表出席了中共豫东南特委召开的豫东南七县党代表会议。回来后对会议关于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的决定，做了认真的讨论，和具体部署，还将会议精神及时向扁担会中的党员骨干进行了传达。在代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经过宣传发动，要求参加扁担会的人越来越多。吴伯涵及县委的负责人因势利导，深入到平楼、刘楼、杨井、石庙及安徽霍邱的陈棚、茶庵、高镇等地，亲自组织动员，把那些出身好，苦大仇深，有斗争精神的农民及时吸收到扁担会中来。到1929年秋，扁担会又增设了平楼、石庙、蔡下园、阎桥、何桥等十三个分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九百多人。活动在以张广、罗集为中心，北至淮河沿岸，南

到大别山麓，东部伸入安徽霍邱境内，西抵杨集、胡族和商城的上石桥一线，纵横百余里的广大地区。

为了发挥少年儿童的作用，伯涵在周家湾和石庙集朱家学堂建立了两支少先队，由童篾匠和孙瑞炎任队长，他们主动站岗放哨，打听消息，传递情报，为扁担会做了一定的工作。

在组织扩大扁担会的同时，伯涵十分注意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他将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好的立场坚定的会员，积极向县委推荐。在张广学校首先接收张仲武入党，接着吴伯涵又介绍帮工出身，参加扁担会最早的向德根、孙金友入党。1928年秋在九龙村建立了扁担会中的第一个党支部。直接属县委领导，吴伯涵兼任支部书记。嗣后，蔡善芳、蔡仲美、周新久、周光普、尹东轩、殷海洲、周杰斌、周维才、董云重（后叛变）、游文山、王玉如（后叛变）等三十多名骨干会员也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杨井、刘楼等十三个扁担会分会中建立了党支部，由县委任命了各支部的负责人，至此，扁担会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为了“创造暴动条件”，“实现割据局面”，县委决定在扁担会中建立游击大队。以党员为骨干，挑选扁担会的中坚分子参加，开始三十多人，后来扩大到近百人。吴伯涵任大队长，蔡仲美任政委，下设三个小队，建队时仅有两支手枪和几支老套筒，主要武装是大扁担，长

矛和大刀。

吴伯涵从扁担会建立起，便领导会员同税卡、盐卡、地霸、土匪及反动当局开展了针锋相对地斗争。游击大队成立后，伯涵又率领这支队伍，为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英勇奋战。

打击税卡、盐卡。1929年冬，吴伯涵、蔡仲美率扁担会员三十多人，从安徽河口集贩盐归来，在三道堰与霍邱县的盐卡遭遇，贪婪的盐卡又象往常一样扬言要“照票”查税，进行敲诈勒索，会员们早已怒不可遏，他们操起手中的大扁担打得税卡个个鼻青眼肿，喊爹叫娘。从此，税卡再也不敢在这里横行霸道，来往客户可以畅行无阻了。

抗租抗粮。1929年秋旱灾严重，收成仅有往年的一半，但官府、地主的课项有增无减。广大农民的生活难以维持。这年冬，吴伯涵发动和领导了张广一带方圆几十里的抗租抗粮斗争。亲自在洪家楼（今刘楼村）召开扁担会骨干和佃农、雇农参加的群众大会，部署“双抗”行动计划。广大贫雇农积极响应，不交租、不交粮。仅张广庙一个村就有七十一户农民拒不送租送粮。最后抗粮的群众在吴伯涵的鼓动下，一鼓作气，驱走了官方派来催粮的差役，打击了最反动的地主，要回了为抗粮被抓走的会员，取得了抗粮斗争的胜利。

惩治地霸。杨井子地主胡兴才，挖沟筑寨，以护寨为名买回枪支，为非作歹。1929年春的一个夜晚，吴伯涵、蔡仲

美带领游击队员向德根，朱怀同等十几人，冒雨冲进胡家，给其以教训，并夺得长枪一枝，银元六十块。

大义灭亲。1929年秋，伯涵的革命活动为其堂弟吴伯洲（行二、伯涵家庭的主事人）发现，受到训斥。吴伯洲说：“干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我们家有田、有地，有钱、有势，你怎么能和那帮穷光蛋一起胡闹呢？”伯涵反驳说：“这个世界太不公平，种田的没有粮吃，织布的没有衣穿，而官吏、豪绅不劳动反而吃的鸡鸭鱼肉，穿的是绫罗绸缎，我们就是要联合劳苦大众把这个世道翻个个。”并劝说吴伯洲参加共产党，一道干革命，为推翻旧世道出力，而吴伯洲顽固不化，对伯涵的话置若罔闻，还强词夺理，硬要“伯涵洗手不干”，两人各持已见，骑虎难下。最后吴伯洲露出了反革命嘴脸，竟声称“如若再干共产党，我就报告蔡大爷（即剿共大队长蔡筱谷），让他将这里的共产党一网打尽。”伯涵感到情况紧急，他以革命利益为重，抛开手足情，毅然决然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亲自安排党员周杰斌、周维才将吴伯洲秘密处决于张广桂桥，清除了隐患。

参加攻打商城的战斗。1929年12月24日，奉红三十二师师部命令，吴伯涵和蔡钟美，集扁担会中坚分子三十多人，连夜顶风冒雪赶到指定地点，与我县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的部分人员一起，于25日晨参加了攻取商城的战斗，由于吴伯涵、蔡仲美等人机智灵活，作战英勇受到师部的表扬和奖励。

袭击反动民团。匪首张宇藩逆历史潮流而动，为阻止苏区人民与大别山腹地联系，以“联防”为名，将其民团移防郭陆滩镇，与当地官吏地霸勾通一气，抓丁派款，搜刮民脂民膏。1930年2月初，吴伯涵和蔡仲美在亲自侦察并和红三十二师取得联系后，带领独立团战士二十余人夜袭郭陆滩，打死团匪十余人，缴获长枪八支，团部被摧毁，张匪落荒而逃，后又乖乖地缩回张老埠，不敢在郭陆滩兴风作浪了。

吴伯涵还领导和参加了扁担会及游击队镇压反动地主张国彬；惩罚恶霸李家成，处决匪首董大牛等许多重大活动。

（五）

扁担会的斗争越来越深入、广泛，威望越来越高，广大人民拍手称快；以蔡（筱谷）、董（秉成）、万（子新）三霸为首的地方反动势力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进行了疯狂地反扑，施展种种阴谋，欲置革命者于死地而后快。

1929年冬，县委在蚂蚱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30年农历3月28日，利用张广东岳庙逢会，老百姓赶会，豪绅地主聚会的机会举行暴动，处死蔡、董、万三巨头，建立苏维埃政府。为保证暴动的顺利进行，扁担会的游击大队遂扩编为固始县独立团（辖三个营），蔡仲美任政委兼团长，吴伯涵任副团长，独立团作为暴动的骨干力量，吴伯涵为主要指挥者之一。

1930年初，正当暴动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间一天天逼近的时候，张金山、洪玉章、王玉如先后叛变革命，将扁担会的行动情况报告给反动民团头子、铲共大队长蔡筱谷，

蔡匪凶相毕露，立即设下陷阱，对伯涵下了毒手。2月24日，蔡筱谷以议事为由，差人邀吴伯涵到大队部。伯涵虽已觉察到势头不对，但唯恐不去会引起蔡的怀疑，影响整个部署，他临危不惧，置生死于度外，仍按时赴约，刚走进大队部院内，伯涵被蜂拥而上的团丁摘下身上佩带的手枪，捆绑起来，关押在后院一个阴暗潮湿的房子里。

在秘密地审讯中，老奸巨滑的蔡筱谷假惺惺地对吴伯涵说：“你是我的分队长，参加共产党是受了别人的欺骗，只要你交出暴动计划和领导人，向我认个错，我马上就释放你，你仍然是我的分队长。”伯涵坚定地说：“参加共产党，并非上当受骗被人利用，是我自觉自愿的。暴动计划是我们党的机密，我一个字也不会告诉你。”蔡筱谷恼羞成怒，嚎叫着“给我用刑！”刽子手先让伯涵坐老虎凳，后用麻绳“锯”，再吊在梁上用皮鞭抽打，几经折磨，死去活来，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血迹，但他神态自若，拒绝回答敌人提出的一切问题。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杀人魔王蔡筱谷，对伯涵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他冷笑着说：“吴伯涵，你这叫自讨苦吃，知道我的厉害了吧？现在回头还不晚。”没等蔡匪说完，伯涵愤怒地说：“要杀、要砍，由你，要想得到什么，休想！总有一天，人民要铲除你这个害人精的！”蔡匪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嚎叫：“这些人和共产党铁了心了，杀、杀、杀！”1930年2月28日，吴伯涵、蔡仲美等七人被杀害在张广庙北头的杨井岗，伯涵年仅三十二岁。